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缠

——以 1930—40 年代“战国策派”思潮为例

江 沛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 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拯救民族危机与向现代转型是发展的两条主线,由此形成了既要反对西方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就要倡导中国文化独立性,反对西方文化传入;既要开放中国,学习西方以融入世界,就必须反对民族主义思潮,批判传统文化的相互矛盾的双线走向。在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战国策派”主要人物与追求自由主义信仰的众多知识界人士一样,在思想理念上发生了迎合民族主义思潮的转变,倡导“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呼吁个人自由暂时让位于民族自由,为时势所迫主张集权政治,并将民主政治与民主主义硬性割裂。救亡与启蒙的两难,观念与现实的冲突,自由主义内核与民族主义外衣的交织,在战国策学人论述中表现十分突出,也是那个动荡时代知识群体中思潮繁杂现象的典型反映。

关键词: 战国策派思潮;自由主义;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 K264.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3)01-0039-09

Entanglement of Liberalism and Nationalism: the 1930 - 40's Ideological Trend of Zhanguoce Clique

JIANG Pei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As far as modern Chinese society was concerned , to save the national crisis and to achieve modern transformation were the two major developing lines during the course. Thus for one thing , advocat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independence and resisting the coming of Western culture was crucial for the resistance of the Western aggression and the defending of national dignity , and for another , we must oppose nationalist thought , criticize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learn from the West in order to open the door and integrate China into the world , which composed two conflicting routes. Since the 9 • 18 Incident , national crisis had risen up to become the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 in China. Like most intellectuals pursuing liberal beliefs , representatives of the Zhanguoce Clique converted their thought and began catering to nationalist ideas , advocating " state supremacy and national supremacy " , and calling for the temporary replacement of individual freedom with national freedom. Confronted with pressing moments , they proposed a totalitarian state , and rigidly fragmented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democracy. Zhanguoce Clique's discourse evidently displayed the dilemma between salvation and enlightenment , the conflict of concept and reality ,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liberalism core and nationalism imagery , which also reflected the ideological complexity of the whole intellectual group during that turbulent era.

Key words: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Zhanguoce Clique; liberalism; nationalism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形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一趋势所独

有的复杂性及矛盾性,不仅推动着现代经济的快速变动,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多重整合,也使

思想潮流呈现出了新旧杂陈、变与不变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近代中国诸多思潮都难以纯粹追求学术旨趣,都必须面对“救亡图存”时代需求的诘问。以文化形态史观为学术理念、以西学改造中国文化为根本取向的“战国策”派思潮,同样努力为现实政治献“策”,并呈现出时代挤压下的学术性与政治性思考交织、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理念纠缠的复杂形态。

一、近代中国的双线走向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矛盾

19 世纪中叶始,近代中国在欧美列强的压迫下被迫开放,并开始接受由欧美列强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中国丧失了诸多主权,深陷“亡国灭种”的危机。现代工商业对于传统农业、手工业的有力冲击,导致大批失业者出现及传统经济的衰败,使得排外情绪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在两千年来的“天朝大国”心态和近代民族国家思潮的基础上,中国思想界及民众日渐积累出恢复民族独立的强烈意愿,在形成巨大凝聚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以盲目排外为特征的义和团运动,并孕育了以救国为旨归的一批思想家,形成了影响近代中国走向的激进民族主义思潮。

在这一过程中,现代思想体系的重要理念如自由、民主、博爱、平等、人权等价值判断,开始传入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与旧有的专制、人治、绝对平均等理念产生了尖锐冲突。思想界日渐理解,中国落伍于世界并非只是曾被蔑视为“奇技淫巧”的科技及工商业之不足,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从中难以找到适应现代化进程的要素。因此,中国社会的根本转变,不仅在于现代经济的引入,更在于思想观念与制度体系的更新,于是清末民初便有蔚为大观的新思潮纷涌景象。

由此,中国社会与文化开始陷入如李泽厚先生所言的“救亡压倒启蒙”的深刻悖论^①。一是在外来侵略的背景下必须追求民族独立,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因此要高扬民族主义大旗。这种思潮与“天朝大国”及文化至上的心态揉合为一,造就了近代中国激进民族主义思潮的甚嚣尘

上,进而反对侵略中国的西方所象征的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而在现代经济及思想体系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社会、文化及制度又不可避免地开始从传统形态向现代转型,必须要以“列国酵素”培养新文化因子,因此要倡导现代经济、制度与自由主义理念,必然要反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及意识形态。

于是悖论出现了。中国社会及思想界一方面要倡导民族主义以“救亡”,强调“中体西用”观,反对以西方为代表的外来侵略,指斥现代经济体系是中国社会沦落的根本原因,民主共和体制是北洋时代兵灾难息、政局混乱的元凶,这一思潮矛头所指自然也包括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及其理念(以自由主义为代表);另一方面,为摆脱“东亚病夫”的地位以圆强国之梦,又必须融入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学习现代性的生产方式及制度文明,进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任由激进民族主义横行。在毛泽东归纳的近代中国社会根本任务“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演变轨迹中,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潮的碰撞,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发展中本质性的矛盾与困境。

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倡导与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以自由主义理念对中国社会及文化进行根本改造的激进改革,对于具有“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群体性格特征、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入世文化观的中国知识人而言,显然是难以接受的。而强调民族主义的“救亡”以保存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更能获得广泛支持,也极易被政治势力所依赖。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力量的结合,使得民族主义在不同时期的意识形态中始终强势,多数知识分子也同样遵从之^②,由此也决定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思潮及自由主义知识群体的弱势命运。

“战国策”派学人均生于 20 世纪初,成长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及文化的转型期,思想接受了五四时期新文化的熏陶,又有留学欧美的教育背

^①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氏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1 页。

^②许纪霖《紧张而丰富的心灵:林同济思想研究》,《历史研究》2003 年第 4 期。

景,西学及世界发展对其影响远大于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的烙印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喧嚣也同样刻骨铭心。1930年初他们学成归国之时,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内战不已,九一八事变更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危机。一二九运动中青年学生提出的“偌大华北,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口号,正是此时学术界、文化界主流心态的真实写照。

二、民族主义的诉求与自由主义的妥协

民族主义的兴盛,是近代中国百年危机压力下的重要现象,其核心理念在于维护传统文化,强化民族自尊、自信的凝聚力,伸张中华民族的自决权,同时也为政治统治奠定合法性基础。然而,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思潮,过于强盛就会引发诸多冲突。民族主义者认为,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是民族或种族,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要求牺牲个人利益以获得民族利益的实现,主张权力及资源的独占,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理念庞杂又常被随意曲解,时常妨碍自由主义的伸张与民主政治的推行^①。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及此后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刺激了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全国,“抗战文化”、“抗战歌曲”、“抗战文学”、“抗战诗歌”、“抗战电影”等风起云涌。在文化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民族主义主题的表述极为醒目,知识分子群体的入世传统,又为其推波助澜。

在此背景下,蒋廷黻、丁文江、钱端升、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先后发生转向,“战国策”派学人同样极力表达支持民族主义思潮及在现实政治中体现的服务抗战的主张,也唯如此,方能在文化界获得一席之地。“战国策”派学人声言“本社同人,鉴于国势危殆,非提倡及研讨战国时代之大政治(High Politics)无以自存自强。而大政治例循‘唯实政治’(Real Politics)及‘尚力政治’(Power Politics)。大政治而发生作用,端赖实际政治之阐发,与乎‘力’之组织,‘力’之驯服,‘力’之运用。本刊有如一‘交响曲’(Symphony),以大政治为‘力母题’(Leitmotif),抱定非红非白,非左非右,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主旨,向吾国在世界政治角逐中取得胜利之途迈

进。”^②此后,“战国策”派学人经常使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民族主义”、“民族意识”等含义不尽相同的名词,阐释其改造国民性及中国文化特质的主张,但本质相去不远。“非红非白,非左非右”,表明了“战国策”派思潮鲜明的文化自由主义的宗旨。“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则是其认识近代世界和中国文化总体规律的逻辑结果,也是其对民族主义诉求的积极响应^③。

与纯粹受民族主义思潮影响而起者不同,“战国策”派对于民族主义的认识,基于文化形态史观的理论逻辑。在他们看来,世界上各个独立发展的文化区域间自古以来就存在民族与国家间的竞争^④,而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世界进入了文化整合时代,“西洋文化,都是世界的主流”^⑤。在整体发展中,民族或国家就成为各个文化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单位或称“时代的界线”,以民族间、国家间的关系、矛盾、斗争为要素的民族竞争,是世界历史的“时代的大前提”和重要特征之一^⑥。因此,在民族主义至上的“大战国时代”,每个民族都面临着竞争生存的大问题。就中国而言,“远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族生存问题。说到底,一切是手段,民族生存才是目标。在民族生存的大前提下,一切都可谈,都可做。”^⑦这一时期,“‘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原来并不只是一种抗战期内的口号,乃是一种世界时代精神的回音。”^⑧陈铨明确提出,所谓“战国时

^{①③}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221页。

^②《本刊启事(代发刊词)》,昆明《战国策》第2期,1940年4月15日。

^④雷海宗《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讨论》,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1942年2月4日。

^⑤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列国阶段的形态论》,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1942年6月17日。

^⑥林同济《柯伯尼宇宙观——欧洲人的精神》,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1942年2月14日。

^⑦林同济《廿年来思想转变与综合》,昆明《战国策》第17期,1941年7月20日。

^⑧林同济《第三期的中国学术思潮——新阶段的展望》,昆明《战国策》第14期,1940年11月1日。

代”实际上就是民族主义高扬的时代,“民族主义,至少是这个时代环境的玉律金科,‘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口号,确是一针见血”^①。何永佶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已不是‘大一统’的‘世界’,而是在紧张严肃的角逐中的一员。这世界尚无‘大一统’的象征,春秋战国时代的一切,可于现在世界见之”^②。贺麟也称:“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外观上是反抗帝国主义势力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压迫;其内在意义是反抗保守的军阀和封建主义;文化理智方面,它是对过去的传统和习俗的反抗。”^③“战国策”派学人对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倡导,显然具有一定的学理依据,是从中国文化在“战国时代”如何于竞争中求生存出发的。他们与不少知识界人士倡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提倡以“民族文学”培养“民族意识”,目的都在于重建中国文化,使千年灿烂文明“摆脱了一切‘颓萎’色彩而卷土重来再创出一个壮盛的、活泼的、更丰富的体系”^④。

自清末至 1930 年代,在世界化进程的洗礼中,中国的新学思潮渐次形成,它们意识到以西方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取向,但却无视这一取向是以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的彻底更新为前提的。因此,多数新思潮都有从技术层面上学习西方的特征,诸如“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军事救国”、“实业救国”等不一而足,唯独极少提倡“民主救国”和“自由救国”!这些思潮表露的急功近利心态是清晰可见的,本质仍是“中体西用”,仍然抱定中国文化具有适应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天然合理性,只要利用西学补足科技及工商业上的不足,中国文化仍可独步天下。因此,在面临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面前,诸多思潮都有与民族主义思潮合作的思想基础,常常会“不问国家构成的情形,便以一种对象不确定的国家忠诚感‘报效祖国’,这对国家的现代转轨毫无助益不说,反而发挥了助纣为虐的反作用,成为国家主义的牺牲品”^⑤。

有所不同的是,“战国策”派学人虽然在现实主张上迎合民族主义思潮,但他们并没有在价值层次上彻底放弃自由主义,也决不同意回归传统。林同济、雷海宗等人认为,中国文化自救决

不能复古,“救大一统文化之穷,需要‘列国酵素’”,决不能死抱“大一统型”的“骄态与执见”^⑥。在他们主张里,没有民族主义式的盲目排外与文化保守^⑦,强调以开放的胸襟不断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精神,谋求通过民族主义的胜利获得国家独立,进而实施自由主义的理念以完成宪政,并走上自由主义的坦途。

三、“个人自由”让位于“民族自由”

考察某一个学派或思潮时,如以中国近代组织严密的革命型政党或秘密社团的形态切入,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具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多重复杂性的学派或思潮,内部有不同的声音和丰富的形象,正是其学术个性及信仰自由的价值体现。

“战国策”派的学人构成,本身即存在着教育及知识背景的不同,民族主义的压力对于学人群体产生的不同影响,导致其对一些重大理念的表述不一,对现实政治的主张存在分歧。

民国之后,社会与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因中国与世界一体化而迅速发展,但民族危机压力、政治权力更替、地方势力难以遏制,都使得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并未能在政治制度与思想价值上呈现出自由主义的形态,要求集权及专制的呼声,

①陈铨《政治理想与理想政治》,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1942年1月28日。

②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昆明《战国策》第1期,1940年4月1日。

③贺麟《基督教与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1929年),氏著《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49页。

④林同济《形态历史观》,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1941年12月3日。

⑤任剑涛《建国之感: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⑥《卷头语》,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第3—4页。

⑦暨爱民认为,战国策派学人是一群文化民族主义者,旨在复兴民族文化,是一种非常有启发性的提法。参见暨爱民《文化民族主义:“战国策派”与文化重建》,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249页。

反使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生了暂时转向,这一转变只是无力应付救亡图存危机的反映之一,他们寄希望于依赖政治强人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从对中国政治与文化发展的思路上看,他们并未真正放弃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不应简单看作是对中国近代民主潮流的反动。

战国策派学人是从文化形态史观来认识当时世界的,他们倾心于近代西方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核心观念的文化精神,但当他们认为世界进入“大战国时代”的同时,又极力地强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强调全能国家与集权;面对抗日战争的残酷现实,林同济、陈铨的一些言论更将服从国家、民族需要以获取民族独立放在第一位,他们错误地将民族生存与民主自由二者对立起来,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如陈铨声言:“二十世纪的政治潮流,无疑的是集体主义。大家第一的要求是民族自由,不是个人自由,是全体解放,不是个人解放。在必要的时候,个人必须要牺牲小我,顾全大我,不然就同归于尽。”^①林良桐认为“战国时代所需求的,是国家的安全与强盛;民主政治所企图的,是个人的自由与繁荣。前者重团体,后者重个人;前者利于强有力的政府,后者利于无为的政府。”宣称“御侮重于个人,安全重于自由”^②。何永佶说:一个国家,“谁来做大官都行,只要他确能增进国家的总力量,以备‘大政治’不时之需。只要他的设施,系向着时代的方向走”^③。

陈铨从哲学和文学的角度考察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危机。陈铨认为“二十世纪的政治潮流,无疑的是集体主义。大家第一的要求是民族自由,不是个人自由,是全体解放,不是个人解放。”^④他认为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精神,“在西洋自然有历史的背景,有清楚的界限,在中国却成了个人自由无限伸张的工具。对于一切的传统都重打倒,对于任何的英雄,都不佩服”是知识群体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面前“一盘散沙”的重要原因。因此,怎样改变教育方针,发扬中华民族的潜在精神,培养英雄崇拜的风气,“是中国目前最切急的问题”^⑤。他试图引进尼采思想,提倡“力”与“英雄崇拜”,以文学培养“民族意识”来改造国民劣根性、凝聚民族

向心力,以使中国能在世界民族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在这里,陈铨混淆了中国传统个人主义与近代西方自由主义间的本质差别,将抗战期间战场上及大后方出现的一些消极抗战问题,完全归因于“五四运动的流弊”,甚至声称“平民教育要太发达,中国民族,一定更不能崇拜英雄,更是一盘散沙,这次抗战,更没有人去拼命了”^⑥,则走到了否定近代中国现代性走向的极端。在介绍尼采政治思想时,陈铨提出“假如战争是人类进化不可少的工具,那么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自然不适宜于战争”^⑦,其指向还是可以揣测到的。

在这里,战国策派学人出现了割裂挽救民族危机与以现代理念重建中国文化间关系的重大理论失误,似乎民主政治不适宜抗战,只有政治集权方可御侮,民族危机过后,再倡行政治民主与自由主义理念。作为书生的他们,没有意识到在缺乏民主传统与有效程序的中国,政治集团为利益驱使而集权,具有丰厚的生存土壤,集权体制能否顺利向民主体制过渡,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从雷海宗将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集权牵强比喻为“一党专政”可知,“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并非“战国策”派学人的初衷与理想,客观上却迎合了国民党政治权威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正是在“民族至上”的前提下,战国策派学人踏着救亡压倒启蒙的动人节拍,不自觉地跳起以全能政治节制民主政治的镣铐之舞,自然会招致不少左翼文化人的严厉批判^⑧。当然,一些文章出于政治宣传需要,将“战国策”派学人与陈立夫

^{①④}陈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重庆《民族文学》第1卷第3期,1943年9月7日。

^②林良桐《民主政治与战国时代》,昆明《战国策》第15—16期,1941年1月。

^③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昆明《战国策》第1期,1940年4月1日。

^{⑤⑥}陈铨《论英雄崇拜》,昆明《战国策》第4期,1940年5月15日。

^⑦陈铨《尼采的政治思想》,昆明《战国策》第9期,1940年8月5日。

^⑧胡绳《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重庆《读书月报》第2卷第10期,1941年1月1日;汉夫《“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重庆《群众》第7卷第1期,1942年1月25日。

等所谈“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合二为一,似乎两者在里应外合,并称“战国策”派学人要替国民党统治“提供学理依据”的说法,也有失过激。

综上所述,“战国策”派学人倡导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观念,导源于其所尊奉的文化形态史观及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现实需要,它既要追求民族独立、融合近代西方文化精神以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又要为民族救亡而鼓吹放弃个人自由的原则,甚至与政治保守主义纠缠不清。这种两难的尴尬,正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之一。

四、自由主义内核与民族主义外衣的交织

尽管本人认为对“战国策”派学人不应以革命型政党或社团的惯性思维去理解,但学人们在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上还是有相当多共性的,在民族主义的表述上同样如此。如果将之放在 20 世纪中国历史与社会变动的大格局下去考察,或许能较为真切地理解“战国策”派学人思想的杂芜。所以称自由主义为其思想的内核,源于其来自共同的西式教育背景及文化形态史观的逻辑,他们并不仅从中国文化的传统出发,而是以未来为出发点的;所以称民族主义为其思想的外衣,则是由于其已认识到,思想服务于现实需求毕竟只是权宜之计。

雷海宗声称“今日的世界,在西洋文化的笼罩下,呈现一个人类开化后的空前现象,就是世袭君主制的大致消灭。多数国家都是共和国,少数的国家只维持一个傀儡的世袭君主,实权却操在另外一个选举的或用其他法产生的执政者手中。真有实权的君主在今日已是凤毛麟角。”并称“政治上任何实权者的世袭制度,在今日的世界绝无地位。”^①雷海宗显然看出了世界政治体制向民主化方向发展的大趋势。

以世界民主化政治潮流参照中国,何永佶尖锐批判了“军队私人化”、“割据自私”的地方主义势力,主张“军队国家化”。他认为“惟其军队国家化,始有宪政可谈,始有法治可讲,军队而不国家化,则朝立宪法,而暮即可毁坏,所谓人权保障——宪法的精髓——在军队私人化下,不过是一种空谈。国人羨于英、美等国的法治宪政,

而不知他们的宪政,正是建筑于军队国家化的大前提下。”^②何永佶准确归纳了近代独裁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征“‘这国家是本党造的,所以这国家应为本党某某主义的甚么国’,这是道地的独裁者的口吻”,明确主张中国采用西方民主政体。他指出:民主与独裁的区别“不限于政制,而根本在于一种精神、心理、思想之分。在独裁的国家内,人们习惯于视一切‘反对’为‘反叛’,故凡口出半个不字批评政府的,都认为是‘反动’,该枪毙。在民主的国家内,人们习惯于‘反对’与‘反叛’之截然不同,目的一致而意见尽可不一致,意见一致而办法尽可不一致”,也即“意志统一而不是意见的统一”^③。他认为这个“近代政治的窈妙”,“不但我们中国人不懂,即德意人亦不懂”^④。将国民党政权与德意法西斯政权相提并论,充分表达了何永佶对于当时中国政治的极度不满。

关于政治的权能问题,何永佶一针见血地指出“‘权’从甚么地方来,‘责’就向那个地方负。”以往帝王认为权力得之于天,只向天而不向人民负责,皇帝以下的官吏认为权力来自于帝王,就只向帝王负责而不向人民负责;而在民主国家里,官吏民选机制决定着他要向人民负责。这是民主与独裁国家在权力的源与责关系上的根本区别。在民主机制下,以国会等各种方式对政府实行“限权”;而独裁国家则要把一切权力集中起来,不允许其他权力的干涉^⑤。

针对一些人视美国式的选举制度为浪费、奢侈的认识,何永佶指出:民主国家的领袖必须要由选举产生。尽管三四十年代的美国总统竞选

^①雷海宗《世袭以外的大位承继法》,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重庆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第 223—224 页。

^②何永佶《政治观:外向与内向》,昆明《战国策》第 1 期,1940 年 4 月 1 日。

^③何永佶《反对与反叛》,昆明《战国策》第 3 期,1940 年 5 月 1 日。

^④何永佶《意志统一与意见统一》,昆明《云南日报》1940 年 5 月 5 日。

^⑤何永佶《权责论》,重庆《东方杂志》第 41 卷第 23 期,1945 年 12 月 25 日。

费用昂贵,每次要花费 1500 万美元,5000 万选民平均每人要摊上 3 毛钱。他认为,这笔费用与独裁国家领袖靠内战流血换取的代价相比要小得多。他认为,民主选举最好有两个大党,党派过多则容易产生过多的矛盾,导致政权更替过于频繁,不利于政治稳定。在他眼中,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中国政体改造最理想的参照物^①。

贺麟对于民主政体也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观点。他认为,“没有法律的政治,就是乱政,无治,即无有组织,不能团结,未上轨道的政治”。他认真剖析了法律与自由间不可或缺的关系后,区别了申韩式的法治、诸葛式的法治和近代民主式的法治三种政体,认为:申韩式的法治特点是“厉行铁的纪律,坚强组织,夺取政权,扩充领土,急近功,贪速利,以人民为实现功利政策的工具;以法律为贯彻武力征服或强权统治的手段;以奖赏为诱人图功的甘饵;以刑罚为压迫人规范的利器”。诸葛式的法治特点是“信赏罚,严纪律,兼有申韩之长,一方面要去偏私,以求达到公平开明的政治。其有为国为民的忠忱,而无急功好利的野心”。近代民主式的法治特征为“以‘人民自由立法,自由遵守’为原则。政府非教育人民的导师,而是执行人民意志的公仆。人民既是政府训练出来的健全公民,故政府亦自愿限制其权限,归还政权给人民。政府既是人民公共选出来的代理者,人民相信政府,亦自愿赋予政府充分权力,俾内政外交许多兴革事业,可以有效率的进行无阻”^②。随后,贺麟提出:在训政时期,应当采取诸葛式的法治,而到宪政时期则应该采取近代民主式的法治。

雷海宗虽然在文化理念上明确意识到“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实际也不得不吸收”^③,但他同时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的确立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特别是处于“战国时代”的中国,倡行完全西方式的民主政体缺乏社会与经济的支撑,似乎并无能力在短期内纠正散漫无力的国民性以凝聚国力。正是在这一前提下,他声称,在现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里,“共和制度与民主主义是两回事,两者可合可分,并无绝对必要的联系。反之,凡不终日闭眼在理想世界度生活的人,都可看出今日的大势是趋向于外表民主而

实际独裁的专制政治”。他特别举出德国、苏联、意大利三国为例来说明其观点,这一认识在当时欧洲及国内颇具代表性。在这里,雷海宗的自由主义理念因环境而退让,政治保守主义意识开始占据上风。一方面他清醒地意识到了实现民主政治的世界趋势和必备条件,另一方面为时势所迫不得不主张集权政治,并将民主政治与民主主义硬性割裂。救亡与启蒙的两难,观念与现实的冲突,在雷海宗思想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也是“战国策”派学人思想意识的典型反映。

其实,林良桐的有关说法,道出了战国策派学人思想上的极端矛盾:“战国时代需要一个大权在握的政府,‘要政府有大权,即不容多党存在;如容多党存在,则政府必不能有大权’(钱端升先生语)。然而‘政党仍是民主政治所必需的条件。在全能国家中,一党专政,一党治国,严格言之,就不成其为政党’(吴文藻先生语)”^④。林良桐虽然看到了这一矛盾,并称在“努力寻求二者调和的方案,可是直到现在仍滞留于原则与理想的时期”。他明确声称“我并不是主张独裁,但我只指出民主的弱点;假设我们能寻求一种方案,使政府不至于太强而压抑自由,复不至太弱不能抵御外侮,有最高的效率,有最大的安全,我固馨香而祝之。如其不能,则我们似亦不必过分迷信民主政治。御侮重于个人,安全重于自由。”^⑤这一段话,清楚地展现了战国策派学人救亡高于一切的基本思路,也显露出他们对民主体制的认识不足。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拯救民族危机的同时,民主体制虽会对个人自由做出一定限制,但并非以个人丧失自由、国家废除法治为前提。特别是在中国这样有几千年集权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里,以危机为理由倡导集权政治,实际上会使自身滑向政治现代化的对立面。

^①何永佶《从美国大选说到政党政治的“窍”》,重庆《大公报》1944年11月14日。

^②贺麟《法治的类型》(1938年8月),氏著《文化与人生》,第46—48页。

^③雷海宗《无兵的文化》,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56页。

^{④⑤}林良桐《民主政治与战国时代》,昆明《战国策》第15—16期,1941年1月。

结 语

综上所述,战国策派学人基本的政治理念中,具有意识认同与现实选择间的重大矛盾。留学欧美多年的林同济、林良桐、雷海宗、陈铨、何永佶、贺麟等人,无论是检讨中国的政治传统抑或是考察近代西方的政治文化,都是以西方现代性价值标准进行的,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在西方“坚强生动的政治机构”冲击下,以集权独裁为特征的传统中国政治机制难以招架,要求全面引入“列国酵素”以重建中国文化,自然不会将导致中国两千年来“没有政治社会上真正的变化,只有易姓王天下的角色更换”^①的王权主义与专制体制当成抗战法宝。整体考察战国策派思潮,尽管其主张较为庞杂甚至有前后矛盾之处,但不能得出该派学人反对民主政体、甚至不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内核的结论。

不可否认,战国策派学人对民主政治认识的明显转变,是在欧洲战争中各国体制发生变化及中日战争需要的前提下进行的。战国策派学人看到了德、意、日等国集权体制在战争中的高效能,看到了欧美各国在应付战争时建立“危机政府”的相对集权,也看到了两者间独裁与民主的本质差别。面对近代中国危机和抗日战争的艰苦局面,他们忽略了欧美诸国与中国支撑战时体制的基本社会形态间的不同,似乎战时欧美的转变就是潮流,从而割裂了救亡图存与倡行民主政治间的关系。他们不反对民主政治,却错误地以为民主体制必然附带不利于抗战的诸如个人主义散漫等问题,要救亡图存只能缓行民主政治。如任剑涛所言,类似战国策派学人这样的留学精英群体,在当时普遍支持缓行民主政治的国家建构理念,纯属对现代国家建构的严重误解,“既掩盖了国家建构的特质,又扰乱了公众对国家现代转轨的视线,还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学术权威见解。因此,对其进行严肃的学术批判,有毋庸置疑的必要性与重要性”^②。

此外,战国策派学人是在忽视了集权与民主体制间相互转化的条件与难度后发生认识偏差的。与战国策派某些观点相近的王赣愚,有一个堪称代表性的表述“近几年来,中国政治可说

是朝着两个方向走,一面为求事权统一,指挥灵活,以期增进行政效率,适合抗战需要;一面又积极团结全国力量,使人民之自由,与更多之参政机会。前的倾向,姑称之为‘集权’,而后的倾向,则称之为‘民主’,为抗战要实行‘集权’,为建国要促进‘民主’,这中间存着绝对的联系性,丝毫没有冲突。”^③贺麟也称,在训政阶段,“人民不可因政府之权力集中,而误会政府为法西斯化,而妄加反抗。政府亦应自觉其促进人民自由,实现宪政,达到近代民主式的法治的神圣使命,不可滥用职权,不必模仿法西斯的独裁”^④。然而,一旦政治保守主义思潮转化为政治实践后,如何保证战时集权体制增进效能、稳定秩序而不是相反?如何有效地限制权力并防止其滥用?如何保证战时集权体制会为和平建国所必须的民主政治体制的实现创造必要前提?如何促成两者间顺利而和平的转换?对于这些重大问题,战国策派学人几乎都没有明确答案,自然会受到来自左翼文化人和自由主义者的批判。国民党战时集权体制在稳定社会秩序、增加效能、向民主体制转化方面的恶劣表现,令战国策派学人始料未及。因此抗战结束前后,战国策派学人先后回归到对自由主义的认同上,再一次发出政治自由主义的呐喊。1945年8月,何永佶在系列文章里集中讨论了对战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设想,希望国共团结;要求中国从此成为与世界潮流合拍的“地缘国家”而不再是自以为是的“天下国”;要求中国人培养“程序化”的头脑;重视言论自由,力求做到“多数决定”;希望行政机构能够增加效率。他认为,“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人民现在尚在沉闷起来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使之创造新文化,蔚为奇花异卉”^⑤。

①雷海宗《无兵的文化》,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42页。

②任剑涛《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第24页。

③王赣愚《集权与民主——一年来国内政治的动向》,昆明《今日评论》第3卷第1期,1940年1月7日。

④贺麟《法治的类型》(1938年8月),氏著《文化与人生》,第50页。

⑤何永佶《论我国民主政治》,重庆《世界日报》1945年10月9日。

其三 战国策派学人的政治主张在由民主向集权的转变中,除了对民主或集权体制在效率、能力等技术层面的选择之外,还有一个价值层面的意义。他们清楚地指出“西方的个人主义,尽管讴歌个性的独尊,却始终忘不了社会。它是承认社会的……‘法律为治’从来是他们一切自由谈的根基。”^①民主政治的价值基础是承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其制度的着眼点即在保障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专制体制的价值基础是否认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其制度的着眼点是在权力的集中上。林同济所称的“国命潮流”,是“注重统一与集权,是一种向心运动,目的要在层级结构打翻后,再把那些日形‘原子化’Atomized,‘散沙化’的个人收拾起来而重建一个新集体。具体形态的表现,多半是政权集中,军队统一,经济干涉,国教创立等项。最适当的象征可说是百家争鸣后所多少都要产生出来的思想统治的主张”^②。陈铨也认为“二十世纪的政治潮流,无疑的是集体主义。大家第一的要求是民族自由,不是个人自由,是全体解放,不是个人解放。”^③显然,“战国策”派学人在价值层面上对自由主义精神发生了疑虑。所以如此,是由于“战国策”派学人首先是民主主义者,其次才是自由主义者,一旦二者发生冲突,他们往往会以牺牲后者为代价。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民主实现与自由获得,二者是不可偏废的。

如何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保证其本质不被变异,是一个至今仍在探讨的难题。在价值层面上,战国策派学人群体对民主自由的崇尚是显然的,但在战时特定环境下,他们在实践层面上却发生了政治意识的转变,这种转变不应视为对民主政体的非难,将之看作他们对西方现代性在意识认同与现实选择间的矛盾所致更为恰当。战国策派学人群体中所发生的忽视自由意识及对民主政治的认识流变,在20世纪上半叶知识群体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考察“战国策”学人对于民族主义的倡导必须要注意到特定的时代背景,否则极易对一些足以引发歧义的词句进行离题万里的解释,从而误解“战国策派”的核心价值。雷海宗曾说过:我们反对传统文化中的“文德”,但也“绝不是提倡

偏重武德的文化”^④。何永佶在批判中国人缺乏严格意义下的宗教意识时,在感叹西方人的“天召”与“使命”感时,曾举希特勒为例说“他的种种行为,我们不赞成。”^⑤林同济也明确指出:“希特勒的办法是以武力征服一切,把国家、个性与贵士遗风一概蹂躏起来而建立一个机械性的‘车同轨,书同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秦始皇式的世界帝国”,这种极权体制“终使文化走上颓萎的孽程。希特勒绝对要不得!”^⑥谷春帆坚定地认为“中国固需要民族主义,但只是中国式理性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军国式疯狂的民族主义。”^⑦他特别指出“中国人之民族怨毒,已积百年,难以一泄而尽”,因此,克服激进民族主义情绪至关重要,“如何使新兴的民族主义与向来和平主义,谋一妥帖调和处置之方,而成为中国式的民族主义,合理的民族主义,尤为以后百年来中国史上之大问题”^⑧。读着这些旗帜鲜明的文字,并将“战国策”派思潮放在时代背景下细加思考后,相信应该有所感悟。

作者简介:江沛(1964—),男,河南开封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谦干

①岱西《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昆明《战国策》第1期,1940年4月1日。

②林同济《形态历史观》,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1941年12月3日。

③陈铨《五四运动与狂飙运动》,重庆《民族文学》第1卷第3期,1943年9月7日。

④雷海宗《建国——在望的第三周文化》,氏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217页。

⑤何永佶《中西人风格一较》,林同济编《时代之波》,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第34页。

⑥林同济《文化的尽头与出路——战后世界的讨论》,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第177页。

⑦谷春帆《中国会成为近代民族主义国家么?》,昆明《今日评论》第2卷第5期,1939年7月23日。

⑧谷春帆《中国应采的民族主义》,昆明《今日评论》第2卷第7期,1939年8月6日。